

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 梁启超政制观转变的美国因素

付金柱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9)

摘要:梁启超自接触西学后即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又大量摄取由日本明治以来思想界译述的西方思想,在政制观上愈趋激进,由君主立宪而变为民主共和。然而1903年访问美国后,他的政制观发生转向,由民主共和退而为开明专制。对于美国的观察是梁启超政制观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一方面发现美国的民主政治存在诸如庸才当政、选举浪费与贪黷公行等弊端,已经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亦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发现文明程度远超出本土的美国华人社团仍然保持部民观念与村落思想,未能融入美国而形成完整的国民观念。基于上述观察而发生的政制观转变,是梁启超对美国与中国历史经验比较及当时历史情境因素“前后左右”纵横考察后通观审慎的理性判断,更是基于爱国救国宗旨下不得已的选择。

关键词:梁启超;美国;《新大陆游记》;政制观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6)03-0105-10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断求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在西潮的激荡下,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梁启超所谓的器物、制度与文化三个阶段向西方学习的过程^①。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由“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这一系列的变化标志着西方在中国士人思想中的地位急剧上升^{[1]23-26},中国士人的思想亦愈益趋于激进。

在向西方学习介绍西学的第一批“放眼看世界”诸人中,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畲、魏源等虽然足未出中国,然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利用中外典籍介绍西方史地以及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亦有程度不一的评述。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容闳、严复以及驻外使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更是通过实地考察,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先进之处。当时士人学习西方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尊西崇新的潮流,连以“朝廷命妇”身份随其夫钱恂出使日、俄的钱单士厘,也给世人留下了《癸卯旅行记》,成为中国妇女开始走向世界、投身于学习西方潮流的先驱^{[2]637-659}。即便以保守、“排西”闻名的一些中国士人,其实对西方“国政民风”并非一味地排斥,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曾为郭嵩焘副使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出使期间刘与郭积不相能,对以主张学习西方的郭处处掣肘,从遇事抵触到频频奏参,致使郭后来被黜,刘因此被称为“极顽固之守旧派”。然而从其《英轺私记》的使英

收稿日期:2016-01-15

基金项目: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成引进人才项目“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XDB2009-13)

作者简介:付金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 梁启超认为这三期变化是相沿相续的,前一期的相关变化为下一期的变化埋下了“引子”。如“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鸦片战争后渐次发动,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创建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为标志,而制造局译出的科学书为第二期变化打下了伏笔;“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主要从中国甲午战败后开始发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为标志。运动虽然整体上失败了,然而运动的“副产品”废科举、兴学堂、倡游学却成功了,播下了“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民国六七年开始发动,主要以《新青年》同仁中“新近回国的留学生”为代表,“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做全部解放的运动”。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载自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5页。

日记来看,其中亦多有英国政俗的正面评价。他到伦敦两个月后,发现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并且“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由此发出“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3]109-110},放弃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态,而不以夷狄视之,不可谓一大进步。在观察英国议会开会情形时,刘氏发现议会中“各出己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并且“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不以官府为专断,“故其处事恒力争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从之”,不得不由衷地发出感慨,“盖合众议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3]83}。对于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优长,体察不可谓不深刻。显然,这位“极顽固之守旧派”在“私记”中也流露出对西方一些政制风俗的推崇。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70}相对上述诸人,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梁,在晚清危局中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更为迫切乃至峻急。康有为1874年始见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及从日本传入的《地球图》诸书,是为接触西学之始。1879年初游香港,看到英国治理下的香港宫室宏丽,道路整洁,管理严格,同刘锡鸿一样,“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归来“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5]115-116}1882年至北京应顺天乡试,归乡途中“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因此大购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自是大讲西学”^{[5]115-116},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梁启超习知西学的过程几与乃师亦步亦趋,1890年赴京会试归粤途中道经上海,“从坊间见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颇感惆怅。回到广州后经陈千秋介绍往见康有为,康“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于是尽弃旧学,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开始了三年的万木草堂学习生活。1894年即甲午年,梁启超在京师痛感时机之危,“益读译

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决心从西书中探求救国之道。翌年议和成,康有为在京师组织强学会作为变法维新的机关,“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梁启超“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6]16-17}。此一时期对于西学的阅读,为后来《时务报》上政论的撰写打下了基础,梁氏以其常带情感之笔锋,一篇又一篇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脱颖而出,尤以长篇政论《变法通议》而“暴得大名”,康梁的名字也传遍全国。

随着变法的失败,康梁师徒二人亡命海外,思想亦先后发生了变化。两人思想变化的契机虽然有多种因素,然而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均是游历欧美后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在1904年开始了欧洲十一国之游,其游记亦称《欧洲十一国游记》,实际上只出版了《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种。康有为欧游以“神农”自居,欲遍尝欧洲之“百草”,寻找医治中国之“神方大药”,不过这“神方大药”依然是“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君主立宪旧主张。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思想愈益趋于激进,一度有与孙中山联合而进行革命的趋向。然而自1903年游历美国后,“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由宣传民主共和而变为开明专制。对于康梁的变化,两人及时人乃至后人均有一个评价,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举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7]63-64}为证。从康有为本人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三十岁前后君主立宪思想形成后,至死均未发生变化;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世人评论他的变,不过是由于其思想脱节于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是一种“退步”式的变^①。然而对于常常以“流质多变”“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我操我矛以难我”等自我审视性语言评价自己“善变”个性的梁启超,则有着诸多需要探讨其思想变化的空间。其一,如前所述,晚清士人无论是否走出国门,只要接触西学或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均开始了或多或少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此一趋势在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乃至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思想变化得愈趋激进,甚至一度“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7]63}。那么,为什么与当时多数士人

① 针对康有为的所谓不变,桑兵认为要大打折扣,其实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康有为出于主观的故意或客观的限制,将以前的著述或行为增删改纂,将变的情节掩饰起来,将变的痕迹涂抹干净,以维系其不变的形象;另一方面,康有为的不少著述并非即时刊布,而是成稿之后秘不示人,因应时势变化或见识而随时有所改变,反复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修改。参见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233页。

正好相反,游历革命、共和之故乡美国后,反而不进而退,政制主张由民主共和退而开明专制呢?其二,梁启超的这次变化,能否简单地以“激进—保守”“进步—落后”这种“一分为二”的两极化思维定式来予以评价,可否通过考察其所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因素,来分析其思想变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乃至历史的合理性。本文拟从梁启超考察美国的《新大陆游记》入手,通过梁启超对美国的观察及切身体会,具体分析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复揆之以其当时所处的前后左右历史情境因素,探究其思想变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二

从1898年抵日本到1903年由美国返回,梁启超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最初的几年里,思想以激进著称。他自称,“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8]186}。梁启超在日本所接受的西方知识,大多来自于日人的译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9]80}。梁氏通过明治以来日本思想界的大量译述成果摄取西方思想,既受到日本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和接受模式的影响,又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和再创造,因此其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和知识是经过诸多因素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思想体系^①。

梁启超由日本译述引介的西方思想,不外民权、自由与进化等探索民族国家富强缘由之著述,仅在1901年、1902年两年,就先后发表《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笛卡尔)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新民说》部

分章节等文章,用力之勤,无人堪比,由此亦可见出梁启超对于西方新知的急切渴求。梁启超这些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政治理论、历史哲学以及价值观念的文章,实际上是以“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的“开民智”为目的,即“新民”。他此期间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广布新知,“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等等,不一而足,本着一腔爱国热血,“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中国”^{[10]201},思想益发趋于激进。1902年连续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之《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等文,倡言“冒险进取”精神和“革命破坏”说,并给康有为写信直截了当地声称欲“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189}。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思想已经从君主立宪转向排满共和,趋向于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同革命党“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12]371}。

然而,不旋踵间“善变之豪杰”的梁启超就由自由、民主、共和、革命的鼓吹者,转变成了中央集权国家主义学说的倡导者,政制主张也由激进的民主共和制转向了渐进的开明专制论。张朋园先生对此做出了系统的解释,他归纳出梁氏思想转变的五个因素:(一)迫于康有为的经济压力而就范;(二)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三)与革命党感情日坏,不得不退而自固;(四)政治思想由激进转向温和;(五)受黄遵宪影响转趋保守^{[13]110-116}。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识到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美国因素。如张汝伦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以1903年的美国之游为标志,梁的这种转变,从经验上来说是由于其在美国的见闻及感想;从理论上则受伯伦知理的影响^{[14]135}。亓冰峰、潘英则认为,梁启超旅美期间了解到共和政治要有一定的条件,而中国无此条件,因而由激进转变保守^②。而张灏则以为梁启超在游美之前头脑中已经存有国家主义的倾向,美国之行的观察不过“坐实”了这种倾向,并最终转向了国家主义^{[15]141}。上述对于梁启超思想转向的研究,尤其关于梁启超思想转向的美国因素分析,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通过对

① 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和新学——近代中外思想文化的互动与比较(代修订版序)》,载自[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张卫娣:《梁启超国家主义转向的日本因素——以加藤弘之为中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② 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95-101页;潘英:《革命与立宪》,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7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解读,尝试复原梁启超对于美国考察过程中思想转变的具体心路历程,以更加翔实地探究其思想转变的缘由。

梁启超虽然此前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然而亲临美国观察还属首次。因此,他的美国之行目的非常明确,一反中国文人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161]之旧俗,而直言美国之行的目的“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17]203}。他期望像玄奘取经一样,取得美国民主政治的真经,“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8]17},怀着饱满的热情,拿来主义的态度,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拿来应用于中国。然而却事与愿违,考察的结果则是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

对于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梁启超首先看到的就是该制度产生了庸人政治。一些能力一流的秀异之士远离政治,结果导致19世纪的一些美国总统都是平庸之辈。梁启超认为,美国总统多为庸才,“此实我辈异邦人所最不可解之问题”^{[16]62}。发生此问题的原因,梁启超按照英国人布列斯《美国政治论》一书归纳为六点原因,可撮其要端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为体制上的原因。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平时国内各州行政权在州政府,总统无权干涉;而联邦政府诸政务均由立法机构以法律规定,总统则无自由行动的余地,“大统领非立法部之一员也,故其宪法不许大统领及其阁臣提出法律议案与议会”^{[16]61}。正是由于总统不能扩张势力至立法部门,因此“不过一奉行成法之长吏而已”,“故勤慎敏直之人,即可当此职而有余;而远虑博识、雄才大略,非所必需也”^{[16]62}。其二为推选总统候选人技术上的原因。各政党在推选总统候选人时,不推荐本党最为优秀者,而往往推选二三流人才。原因在于第一流人才由于政绩突出而为万众所瞩目,然而其授人以柄可被攻击之处也必多,往往无咎无誉之二三流人才可攻击之处也最少,反而竞选成功的成算较高。一位较为优秀的政治人物欲竞选总统时对友人说:“诸君当知以余为大统领则甚良,以余为大统领候补则甚劣”^{[16]64},一时传诵以为名言,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其三则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形成的人民厌恶专制政体的政治文化。美国独立于反对英王的专制统治,此种意识经百余年而深入人民的头脑,因此最反对克伦威尔、拿破仑式的强权专制人物,即使盛名卓著如华盛顿,为避免人民谤议沸腾,由一流人物而成为强

权人物,两届任满后亦避嫌引退。不宁惟是,由于总统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任满之后,欲再投身政界非常困难,转而从事辩护、商务之别业,“非惟损名誉也,又辱国体”。因此,辞职总统几无业可就,“非生计素裕,甚或罹冻馁之忧”^{[16]64}。此亦为一流人物不着意于总统的一主要因素。

其次,则是由总统选举所产生的政党分赃制。梁启超对于美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非常细致而且深刻,他观察到美国自1828年至1883年实行公务员制度以前,一度实行政党分赃制,“任用官吏之法,殆如一市场”,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退步,即便1883年实行公务员制度后其弊端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新总统当选后,“联邦政府所属官吏,上自内阁大臣、各国公使,下及寒村僻县之邮政局长”,如果非总统所属党派,“无一留者”,全部予以更换,“以酬选举时助己者之劳”,导致大多庸碌无为者,身居政府高位,损公肥私,莫此为甚。梁启超认为此庸碌之辈,“实政界之虱也”^{[16]141},直接导致美国政界之贪贖。

复次,则是选举频繁,充满浪费和腐败。梁启超以欧洲同美国相比较,认为欧洲选举只在国会议员以及政府诸大臣层面进行,而美国除总统、国会议员外,大小官吏无一不选,且任期甚短,因此选举频繁。以辛辛那提市为例,每年平均选举约二十二次,高出欧洲四、五倍。选举频繁的结果则直接导致浪费和腐败,他以纽约市为例,平均每年选举费用高达六七十万美金,且选举费用多取之于各政党之运动费,因此得官之后,需把自己极厚薪俸拿出一部分,“还诸党中,以为下次争选举之用”,使本党势力“愈积久而愈巩固”,以便长期赢得选举,其结果则自然是“滥用职权,蹂躏公益,又事势之相因而至”^{[16]143},滋生贪黷腐败。

梁启超在观察到美国民主政治弊端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他更发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将走上中央集权的扩张性帝国主义之路。他的这一判断得自于对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些演讲和直接观察。梁启超访美期间,曾与罗斯福会晤于白宫,尽管“会晤约两刻,无甚深谈”,然而却对罗斯福评价甚高,称罗斯福之人格与德皇威廉二世相仿,在当时各国元首中,“其雄才大略,有开拓万古推倒一时之概者”^{[16]57}。而这一雄才大略的典型体现,则是罗斯福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自1823年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以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是美国扩张政

策的典型反映。这一政策被罗斯福所继承,在多次演讲中大提而特提,梁启超亦在游记中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予以转录。罗斯福总统在两次关于太平洋的演讲中,极言太平洋这一世界最大洋为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极力鼓吹“余之未亲睹太平洋也,余已为国中主张帝国主义之一人。及今亲见之,而益信夫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之大计,舍帝国主义其末由也。在今世纪中,惟能在太平洋上占优胜权者,为能于世界历史上占优胜权”^{[16]9}。面对罗斯福的帝国主义主张言论,梁启超“怵怵焉累日,三复之不能去”,不得不“愿我国民思之”^{[16]11}。作为我国民之一的梁氏,看到此问题,更是陷入深深的思考。他详细地考察罗斯福倾心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演进历程,尤其对“门罗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实质及演变,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概括而又精辟的结论:“门罗主义之本相,则所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是其义也。及其变形,则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骎骎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16]59}由称霸于美洲转而欲求称霸于世界,道出了门罗主义扩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梁启超还由罗斯福在演讲中“苟吾美国能具置有之海军,且持久而勿替焉,斯我门罗主义,所向无敌矣”^{[16]60}一语,详细考察了美国海军及军舰。美国自以侵略扩张主义为对外政策以来,大肆扩张海军,1903年海军预算已达八百四十万美金,罗斯福在演讲中也一再以扩张海军呼吁于美国国民,“我海军突飞猛进,鄙人所以为国民庆者,莫大于是”,“故扩张海军者,我今日爱国之国民,所当每饭不忘也”^{[16]75-76}。因此,梁启超预言:“以此趋势,岁岁进步,则其凌德法驾英俄,亦当不在远耳”^{[16]73}。由此可见,一贯主张民主共和的美国,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大趋势下,亦走向了中央集权的扩张性帝国主义之路。

梁启超还观察到,美国的这种扩张性帝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上,而且还体现在经济上,则是巨型经济垄断组织托拉斯的出现。对于托

拉斯,梁启超称之为世纪之交的“怪物”“二十世纪之巨灵”,他在游记中设专节介绍,并在游美归来后著长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予以详细考察,具体绍述托拉斯的概念内涵、产生之原因与发展过程、利弊分析以及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等等,堪称最早全面系统介绍托拉斯的中国人。梁启超认为托拉斯为资本主义物竞天择自然进化的产物,如同政治上的竞争必然趋于帝国主义一样,经济上的竞争则必然趋于托拉斯,“托辣斯者,以政治上之现象譬之,则犹自各省并立而进为合众联邦也,自地方自治而进为中央集权也。质而言之,则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专制主义也”^①。托拉斯乃自由竞争的产物,乃为此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遏的大趋势,虽然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一度禁止,然而却愈益发达,不得不解禁而任其发展,其势力已经遍及美国,开始扩张至世界,“由国内托辣斯进为国际托辣斯”^{[16]26}。因此,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托拉斯向外扩张的过程,必然导致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性帝国主义观念的盛行,“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19]60}。随着美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向外扩张,中国将何去何从,这才是梁启超所真正思考的问题。

梁启超考察北美大陆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这里有北美最大的华人社团。他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详细考察了“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梁氏对于在美华人的观察极为细腻,细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尽管生活在美国,但华人处处有着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西方人工作定时而有效率,中国人终日劳苦却效率低下;西方人走路时行色匆匆,中国人走路则悠闲懒散。对于西方人与中国人在会场中的状态,梁启超的描摹尤为传神:“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种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16]125}长期生活在美国民主共和环境下的华人团体之生活细微处皆不如西方人,体现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自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7页。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尤其细致地比较托拉斯发展之各阶段与政治间的关系:“故生计界组织进化之现象,与政治界殆绝相类。试以美国民族发达之迹比例之,其初小工小商,各以自力营生,如殖民时代,个个独立也;及进而为有限公司,则如分治时代,合多数之个人、多数之家族,而成一州一省也;更进而为托辣斯,则如联邦时代,合并各州各省而成一中央大帝国也。吾故曰: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参见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载自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了华人整体素质远未达文明程度,因此梁氏对于华人群体的整体性缺点予以高度概括: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可以说,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群体,其富裕程度要远远超过内地,其文明程度也都基本上达到能读能写,有报馆和章程完备的社会组织,比在国内更适宜培养公民的责任心,更适宜成为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合格公民。可是,梁启超悲观地看到,在美国波士顿、纽约或旧金山等地生活的华人,则是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故乡景观”,唐人街的华人仍然保持着族民观念与村落思想,分裂成若干带有乡土特色的政治帮派,这些帮派忠于“传统”而不是追求进步,孜孜以求的是小团体目标而不是更大的社会公益。因此,梁启超不得不痛心地说:对于中国的国民,“只可以受专制,而不可以享自由”。不过,梁启超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期待着中国出现来喀瓦士(今译来库古)、克伦威尔一样的强权人物,“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6]¹²⁴。开明专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

三

综上梁启超对于美国的考察与思考,一方面美国民主政治出现诸如庸才当政、选举频繁与贪黷公行等弊端,并且在20世纪帝国主义对外竞争趋势下,即便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亦走向了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上中央集权的扩张性帝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文明程度远远超出本土的美国华人社团,仍然保持部民观念与村落思想,未能融入美国而形成完整的国民观念。两方面观察的结果,使梁

启超彻底放弃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想法。在他考察美国结束返回日本的途中,写下了悲观的结论:“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无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16]¹²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更是痛彻肺腑地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20]⁸⁶那么,既然中国既不能实行君主立宪,更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如何才能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促进中国人实现由部民到国民的转变?梁启超在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那里找到了答案,政治思想也由“自由之子”卢梭的崇拜者,转变成了国家主义学说倡导者伯伦知理的拥趸^①,政制主张也由激进的民主共和制转向了渐进的开明专制论。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②,标示着思想转变的完成^③。梁启超虽然知道,在伯伦知理的政体观中,以君主立宪为最良之政体,但由于论说太过繁琐而不予介绍,只介绍其论共和政体之利弊,并加以自己的分析。梁启超指出,虽然伯氏并未忽视共和政体具有养成国民自觉心、互相尊重其人格等优点,但是,这

①关于梁启超接受伯伦知理学说并发生思想上的转变,有诸多学人讨论。参见[法]马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孙宏云:《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韩]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潘光哲:《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301页;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日]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王晓范:《中日摄取国家有机体论之比较——以加藤弘之与梁启超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邓丽兰:《清末民初“梁启超之问”的提出及其争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该文刊行两次,一次是在1903年5月25日,刊发在《新民丛报》32号,署名力人;一次是在1903年10月4日,刊发在《新民丛报》38、39合号,署名中国之新民,并注明:“此题已见于本报32号中,以其所叙尚简略也,且夫作者之所感触别有所在也,故不避骈枝之诮,再撰此篇。”本年从2月20日(中历正月廿三日)至12月11日(中历十月廿三日)梁启超游美,因此可知,此文首次发表虽然在梁氏出游之后,但成稿应在游美之前。再刊虽然署明为1903年10月4日,但实际上则衍期出刊至1904年,即梁启超回到日本之后。至于两次刊行内容上的差别,将拟专文讨论。

③关于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有突变说与渐变说两种说法,韩国学者李春馥有一个比较翔实的辨析。参见[韩]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种制度生长在其特定的土壤中。比如法国大革命后,虽然也一度建立起了共和政体,但是由于法国国民的性格“好新易迁”,社会上也没有自治的传统,而以中央集权为治国之道,因之革命后的法国“表面则装示共和政治之美名,其实质则与君主政治无毫厘之异也”^{[20]77-79}。至于美国之所以能够变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而为民主共和,关键源于英国的议院制度、自治制度以及自助、互济之精神,因此美国的共和政体“非出现于独立之后,而出现于殖民之时”^{[20]77-78}。梁又进一步指出,就伯伦知理来说,共和制度的消极因素不局限于其建立需要特定的条件,甚至建立之后,亦表现出一系列的消极因素,如在美国不能为国民谋求高尚的品格,而崇尚实利主义;由于嫌忌专制而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则对外不能扬国权,对内不能保秩序;尽管宣扬平等主义思想,但仍然产生出歧视黑人等下层人民的倾向,等等,与梁启超对美国的观察多相契合。而军事方面在梁启超考察美国时则发生了变化,时移世易,美国已经开始走上了扩军备战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主义之路,在制度上由民主共和趋向于集权专制,此亦益发证明集权专制乃当时世界之一大趋势。在伯伦知理之外,梁启超在文章中还特意介绍另一德国思想家波伦哈克的国家理论,强调指出共和制度的缺陷。其中,波伦哈克对试图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制度而产生的各种破坏性后果,梁氏尤为认肯。波氏认为,“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梁氏借波伦哈克之理论,申言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之危。革命之主旨即在于推翻君主专制之政体,而求之服务于人民之国家之目的,然而实际上则事与愿违。因为革命之后,社会势力总是被转移到率先参与革命的四分五裂的无产者团体手里,他们没有财产,革命最积极。然而,此一阶级因无组织,且“日走于极端,而遂取于灭亡”。因此,革命的最终受益者往往是富豪阶级,此一阶级为“保其生命财产之安全”,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稳定,首先想到的则是重建旧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历史上之国家,既已覆灭,今欲使一姓再兴,重复其旧,则其结果更酿百弊;欲别拥新主,而无一一人可认其固有之权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议院制度,终觉其主权微弱,不足以救济沈痾疮痍之社会也”^{[20]83-84},结果则往往是出现一位受人欢迎的强权人物,以民主专制政体取代旧有的君主专制制度。通过对伯、波二氏国家理论的介绍,梁启超旨在使国人明白,在一个缺乏必要条件的国家

里,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政府,结果将是如法国的共和国和拉美尝试共和制度诸小国那样,产生一个不负责任、动乱不止的专制政府。因此,梁氏“不憚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吾涕滂沱”者再三,痛别深爱已久的卢梭之民主共和制,不得不屈就于伯波两氏之国家主权观,并最终走向开明专制论。

梁启超彻底舍弃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转变为开明专制的大力倡导者,则是在1905年。该年年末,梁启超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断言当时的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21]53},中国只适合专制政体,不是选择,而是必然。梁启超再次发出《新大陆游记》中所散发出的悲观情绪,认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制度不可谓不美,然而不适合于目前的中国。他认为如果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立即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由于中国实行君主专制的时间特别长,不仅下层民众素质低下,即使上层官绅亦无民主自治的能力与传统,均无共和国公民之资格,将会出现社会动荡,必将出现一个较之君主专制更坏的强权军人专制政体,因此,“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21]50}。同样,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亦不具备。梁启超除在理论上阐述国民素质未及格外,更从技术角度一一列举诸如国民资格尚未编定、学校尚未遍立、选区尚未划分、户口尚未统计、地方自治制度尚未颁行、警察尚未普及、法律(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尚未制定,等等,这些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的必备条件,都需假以时日才可成熟。而要使这些条件成熟,必须在强有力之政府下,“网罗一国之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21]82}。就是说,中国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至少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开明专制。梁启超把专制分为野蛮专制与开明专制两种,区分的标准看其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21]22}。尽管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专制制度,但是如果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就不啻为一个好制度。梁氏列举了一系列经由开明专制进入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国家,以及目前仍然实行开明专制的国家,经过这样的分析与比较后,他认为中国就其国家特征与时代环境均适用于开明专制制度。然而正如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上述条件为梁氏赞成中国开明专制制度的直接理由,他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理由,即“国家理性”问题。梁启超对开明

专制的倡导,是其关心国家理性的一个自然发展,是其在当时的帝国主义时代解决中国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而有效的方法^[15]149-153。而国家理性问题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伯伦知理的国家主权观。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理论,宣称主权既不在统治者,也不在人民的意愿,而在于国家本身。而这个观念的接受,得自于梁启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直接考察,除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瓜分的进一步加强外,他在美国又观察到,奉行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已经走向了扩张性的政治、军事帝国主义之路,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托拉斯经济垄断组织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日益成为中国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他认为鉴于中国在此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需要,必须维护国内秩序的稳定。而为了内部秩序的稳定,由政府权力强制的强制是最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即“对于异种类之竞争必获优胜,否则劣败。何以故?必有秩序然后彼此之行为,可以预测其结果而不至冲突故;必内部无冲突然后能相结集以对外故。虽然,所谓秩序云者,非自始焉放任之而可以自致者也,其得之也,必以强制。强制者实社会所以自存之一要素也。所谓以强制助长竞争者也”^[21]15。因此他赞同十九世纪学者的观点:“国家固为人民而存在,人民亦同时为国家而存在。国家于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于一方面亦为自身谋利益,若人民利益与自身利益不两立,则宁先自身而后人民。故国家者目的也,而人民则有时可以为供此目的之手段也。”^[21]29-30此明确表明国家利益优先于人民利益之国家理性观,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可以实现。只有在一个开明而温和的权威政权下,才能达到国内秩序的稳定,才能实现从部民到国民、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并达致君主立宪进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

四

享誉海内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家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进行反思,提出对于辛亥革命必须进行上下300年的探索,即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同时还要进行100年的展望。他认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进程以及后果,都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谈得上

对历史本身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他以辛亥革命后“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句话语为例,大家讲得最多以至于耳熟能详,然而实际上并未讲透。何谓“共和观念”?不同人群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共和”不仅是观念,还包括一整套制度、机制以及礼仪、服饰等等的政治架构,对于部分精英群体可能确实“深入人心”,但对于众多民众来说,即使肤浅了解已属难能可贵,又谈何“深入人心”?如果真正“深入人心”,何尝会有当年革命志士“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极端悲愤?^[22]14-16因此,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近代史,对于在此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制度变革乃至思想文化演进,必须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体察到中国近代史的多种面相。

对于中国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在这一时代,从政治到社会,从制度到思想,无不处于“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的“过渡相”中,梁启超喻之为“如驾一扁舟”,“两头不到岸之时也”^[23]27-30,一切都处于未确定状态中。中国将向何处去?不同的人物提出不同的主张。因此研究此过渡时代之过渡人物的过渡思想,正如罗志田所论,“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其中对于时空环境的考察既要注重中国近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多元互动,还要关照整体的中国内部事务与国际风云的交互影响^①,惟其如此,才能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有深入一步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常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桑兵更是明确揭示,“研究者必须更加注意相关史事发生及衍化的时序,解读文本不可脱离具体时空联系”,其思想的改易受相关人事、时势变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参阅前后左右相关资料,通过了解具体的语境了解梁启超思想的本意,才可从中解读梁启超个人观念变化的脉络^[24]230-235。梁启超本人对此亦有着深刻的自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其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25]27-28,则是其体认自己“善变”个性的夫子自道。梁启超思想的每一次变化,既有着其思想自身的内在演进因素(“脑识之发达”),更是与所处时代前后左右具体的历史情境因素(“随时与境”)如影

①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外,罗志田对于近代中国过渡时代的士人学人与学术思想以及过渡时代的丰富性,均有着极为深入的分析。参见氏著:《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随形。

在梁启超看来,无论主义与政见、国体与政体的变迁,都属于方法层面的选择,只要出于至诚的爱国乃至爱民宗旨,则不应视为反覆变节,而应理解为改过迁善^①。此亦可解释他1903年从北美归来后政制观的突变,即由地方分权的民主共和制转变到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制。至于突变的原因,即是他从《新大陆游记》及以后一系列论著中一再提到的历史因素与现实情境因素的考量。美国民主共和制成功的奥秘在于其乡镇、州的长期自治传统,而中国却无此自治的训练;再根据他对当时国际政治情境的观察,认为帝国主义的对外竞争将是20世纪的主要趋势,在此趋势下即便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亦出现了军事扩张以及中央政府权力增长的势头。因此,在此“人方务合群小以为一大”的帝国主义国与国竞争急剧时代,实行中国传统政制中所不具备自治传统的民主共和制,则“无异蒸沙求饭”^{[26]43、54},不但民主共和无法实现,而且会出现亡国的结局,这则恰恰背离他一贯的爱国救国的宗旨。然而,梁启超在主张中央集权之开明专制的同时,亦非排斥民主共和制度,并认为要想实现民主共和,就必然需完成从“部民”到“国民”的转变,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则必然要“启民智”。梁启超从1902年在《新民丛报》连续刊载的《新民说》则是“启民智”的一个系统阐释。梁氏之所谓“新民”,并非如朱熹所释义式的“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②,而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27]5}。一方面尽管不可避免地存有“淬厉其所本有”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则是提出一整套“采补其所本无”的西方之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即梁氏的“新民”更多的是西方式的“新的公民”^{[15]88}。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点,他认为中国只能通过“新民”的启蒙,使诸如“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否则则正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济投湖自尽,成为当时学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轰动性事件。一般认为梁济是“殉清朝而死”,然而实际上

则正如论者所分析,梁济之死是一种“有计划的死”,其死因是源于对共和体制的失望。辛亥革命后非但未能减轻人民之痛苦、换得人民安泰,反而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而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因此梁济以求一死换得国人的觉醒^{[28]142-146}。民国共和制度建成已近十年,然而仍然需要梁济以死来唤醒国人的共和观念,此一事件益发证明“启民智”以成“新民”非朝夕可至,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此,对于梁启超美国归来后政制观的转变,不能简单地以“激进—保守”“革命—改良”“进步—落后”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思维模式来进行处理,实际的历史情境因素要复杂得多,在此两极间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近代中国变幻莫测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无疑当属其中针对列强欺凌面临亡国灭种境况的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富强独立之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因素下,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开明专制的几种政制观间犹疑、徘徊。即以本文所探讨这一时段为例,梁启超“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由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转至开明专制,是他对美国与中国历史经验及当时情境“前后左右”纵横考察所下定的判断,是一种通观审慎的理性选择,而非一时激情澎湃情绪化的感性冲动。以后来者的后见之明来看,梁启超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于革命后引发的中国危难局势的预估,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相比,其全面性与深刻性亦不遑多让。不宁惟是,正如论者所见,在与革命党人论战过程中,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双方都在不断地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在思想认识上都有所提高,客观上亦起到了对诸如民主、共和等思想观念的宣传^[29],秉承着梁启超“启民智”以成“新民”的启蒙宗旨,具有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若要急时,做得好,不过苟且小成;做得不好,便要堕落断送了”^{[30]23、24}。这是梁启超1920年考察欧洲回来后所说的话,同1903年从美国回来后一样,依然提倡审

①在梁启超晚年,有学生对他提出保皇与共和、拥袁与反袁的反覆,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和学问上的“屡变”,但认为自己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他坦陈自己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参见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载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419页。

②朱熹的具体释义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页。

时度势,稳健务实。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脱去了《少年中国说》时的激情,然而却仍然寄语“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30][38]}希望青年们发展个性、解放思想,发起国民运动,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爱国、救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可以说,无论梁启超在政制观上如何变化,他的爱国、救国宗旨,以及与此相关的“启民智”、建立现代立宪政治、推动中国走上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奋斗目标,则终生不渝。

参考文献:

- [1]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M]//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钟叔河.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M]//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
- [3]刘锡鸿,张德彝.英轺私记·随使英俄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6]梁启超.三十自述[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梁启超.夏威夷游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梁启超.论学日本之益[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M]//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11]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M]//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12]井上雅二日记[M]//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13]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1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15][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1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M]//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18]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9]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0]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2]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M]//柯伟林,周言.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23]梁启超.过渡时代论[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4]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5]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6]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7]梁启超.新民说[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8]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M]//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9]郭世佑.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J].文史哲,2004(4).
- [3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 周 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To build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ivilian-military integra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in various fields an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ertainly helpful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 as well as coordinate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The Cultural Logic of “China Military Threat” under Western Asymmetric Conflict Context

——Also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Military Strategic Tradition of The Art of War

Zhang XiaoLong

As the global security situation has chang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 of “asymmetric conflict” concept has been re-defined in the Western discourse.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treat asymmetric means of warfare as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ome foreign researchers have taken Sun Tzu’s doctrine as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 order to prove the inherent genetic threat existing in the Chinese strategic tradition of culture, thus forming the unique cultural logic of the “China military threa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can work as a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we break the “threat” imag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expose the sophistry and fallacies in the Western strategic theory and return the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o its peaceful nature.

The Proletarian Party Must “Maintain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Party”

——The Classic Writers’ Principle of Utopi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Yu Liangzao

When leading and guid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ers, Marx and Engels advanced the idea that the success of workers’ movements could only be achieved “by solidarity and joint force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enin suggested that the ruling party of the working class needed to “pull together truly” and any factional activities were “unacceptable”. These ideas of classic writers are of som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PC’s practice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American Factors in the Change of Liang Qichao’s Constitutional Outlook

Fu Jinzhu

Liang Qichao took to “learning from the West” when introduced to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when he was in exile in Japa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Liang was eager to absorb the Western thought in the translations by the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Meiji. He was getting radical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switching fro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o democratic republic. However, after his visit to the U.S. in 1903, he turned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to the enlightened despotism. His observ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his turning of the concept. On the one hand, he found such defects as mediocrity in power, elective waste and malfeasance in the US democracy and it was moving toward centralized imp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found that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with a far higher degree of civilization than their native land still retained their tribal ideas and concepts and failed to merge themselve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omplete national concept. His change in the constitutional outlook,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 was an expression of his prudent rational judgment after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context fac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 last-resort option under the patriotic national salvation.

Some Rational Thinking on How the Political Work Deals with Modularized Training of Troops

Kong Weiyong

The modularized training of troops is a must for reinforcing troops’ adaptability of war,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warfare. Our army started modularized training late and on the comparatively low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work in the training has lagged behind and has come to meet with some difficulties. To adapt itself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roops modularized system, training and operations, the political work must enhance its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in its organizational system, way of thinking, legal sense and army-strengthening culture.